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3.013

“诗意”的去留： 冯至《伍子胥》版本流变与作家心路辙轨

宫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40多年时间里, 冯至小说《伍子胥》多次发表和出版, 从而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版本。其中, 1946年文生本、1955年“诗文选”本和1985年选集本之间的文本异动最为复杂。文生本体现出一种诗意和现实性相互杂糅的状态, 其是20世纪40年代历史语境下冯至逐渐抛弃玄思而转向现实的结果; “诗文选”本大量删改了《伍子胥》中涉及感觉和沉思的内容, 客观上淡化了小说的诗意, 其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冯至按照政治要求改造自我的决心; 选集本剔除了渗透在“诗文选”本中的政治话语, 重新恢复了一部分文生本中被删改的内容, 在客观上保留了小说的诗意, 其体现了新时期话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言说的排斥, 是冯至再次否定“旧我”的结果。

关键词: 冯至; 《伍子胥》; 版本; 作家心态; 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3-0108-09

Deletion and Retention of Poeticness: Version Evolution of Feng Zhi's *Wu Zixu* and the Writer's Mentality Changes

GONG Z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During more than 40 years from 1940s to 1980s, Feng Zhi's novel *Wu Zixu* was published many times, thus forming various versions. Among them, the text changes between “Wensheng” version in 1946, “Selected Poems” version in 1955 and “Anthology” version in 1985 are the most complicated. The “Wensheng” version embodies a state of mixed poetry and reality, which is the result of Feng Zhi gradually abandoning metaphysics and turning to realit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1940s. The “Selected Poems” version deletes and revises a lot of the contents related to feeling and contemplation in *Wu Zixu*, objectively downplays the poeticness of the novel, and reflected Feng Zhi's determination to transform himself according to political requirements in the 1950s. The “Anthology” version eliminates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permeated in the “Selected Poems” version, restores some deleted contents in the “Wensheng” version, and objectively retains the poeticness of the novel, which reflects the rej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by the discourse in the new period and is the result of Feng Zhi's denial of the “old self” again.

Keywords: Feng Zhi; *Wu Zixu*; version; writer's mentality; historical context

收稿日期: 2023-12-20

作者简介: 宫震, 男, 山东胶州人, 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文献史料。

《伍子胥》是冯至20世纪40年代初创作的一部兼具诗意与现实性的小说，长期被视作20世纪40年代作家“转向”的一座“桥梁”：其前是《山水》一类充满哲思的散文，其后则是一些针砭时弊的杂文。然而，不论是“诗意”还是“现实”，它们在《伍子胥》的不同版本中并非一成不变。冯至在1955年选编《冯至诗文选集》时，对小说涉及感觉和沉思的内容作了大量删改，客观上弱化了小说的诗意，增强了政治性，而收在1985年《冯至选集》里的《伍子胥》，又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此前的删改内容，客观上又强化了诗意，剔除了20世纪50年代政治因素的影响。由此观之，通过考察小说版本流变中“诗意”的去留，不仅能够文献意义上理清《伍子胥》的文本异动，还可以版本为视角，呈现作家不同历史时期复杂的精神面向，并进一步综合考察时代语境、文本修改和作家心态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伍子胥》版本述略

《伍子胥》最初发表的情况比较复杂，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刊载《伍子胥》全文或部分章节的报刊主要有：桂林《明日文艺》、昆明《大国民周刊》、昆明《观察报》副刊《生活风》、重庆《民族文学》、福建南平《文学集林》和《世界文学季刊》。具体而言，桂林《明日文艺》1943年第1期刊载了《城父》《林泽》二节，随后又在第2期刊载了《洧滨》一节；福建南平《文学集林》1944年第1期所转载的《洧滨》一节末尾有“昆明大国民周刊”字样，具体章节待考；1945年3月昆明《观察日报》17日、18日版副刊《生活风》连载了《宛丘》一节，24日、31日版又分别连载了《昭关》《江上》二节；1943年《民族文学》创刊号上刊载了《江上》一节；1944年福建南平《文学集林》第1期刊载了《洧滨》一节；1945年《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1期刊载了从《城父》到《昭关》的内容，第2期刊载了从《江上》到《吴市》的内容。其中，只有《世界文学季刊》刊出《伍子胥》全部的正文内容。该刊由杨振声、李广田主编，其于1945年分两期连载《伍子胥》，是为“全刊本”。与《明日文艺》本和194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伍子胥》相比，全刊本个别字句上略有不同。在以上提到的《伍子胥》

诸刊本中，最有可能成为小说初刊本的是桂林《明日文艺》本与昆明《观察报》本。据冯至本人回忆，《伍子胥》最初有几章于1943年在《明日文艺》发表^{[1]20}，40年代的读者也提到过这一点^[2]。这似乎可以证明《明日文艺》是《伍子胥》的初刊杂志。1943年11月，《明日文艺》因故停刊，《伍子胥》也在刊出前三章后被迫中断刊载。1945年3月17日，冯至又在《观察报》副刊《生活风》继续连载第四章《宛丘》，并附说明文字：“这是伍子胥逃亡故事里的第四章。前三章：城父，林泽，洧滨，在桂林出版的《明日文艺》上发表过，这刊物已经随着桂林的沦陷而停刊了。”^[3]由此可见，《观察报》在《明日文艺》的基础上继续了《伍子胥》的连载，二者可以视作一个整体。但据当时读者回忆，从《明日文艺》和《观察报》上只能读到《伍子胥》的一部分^[4]。据此推断，《观察报》恐怕也没有连载完小说的全部正文。

1946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伍子胥》单行本，并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8集，是为“文生本”。该版本《伍子胥》正文部分共九章，另附“后记”一篇，即冯至在1944年12月发表于昆明《自由论坛》周刊的《〈伍子胥〉自序》。相较于《伍子胥》的各种刊本，文生本《伍子胥》对已刊发内容改动不大，其主要作了一些字词的调整。此后诸多版本的修改，皆以此为底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冯至诗文选集》，《伍子胥》参照文化生活社的初版本收入该集中，是为“‘诗文选’本”。该书收录了冯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作品，另附1955年新作序言一篇。冯至在序言中说：“选集里的诗文，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必要的修订。”^[5]而实际上，“诗文选”本在文生本的基础上作了大量删改，其既有字词纠错，也有一些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读者阅读习惯的字句调整，还有一些涉及回应20世纪40年代外部批评和50年代祛除“资产阶级文艺影响”的内容。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至选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伍子胥》，是为“选集本”。该版本参照文生本和“诗文选”本，对小说中的许多词句作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改动。冯至说，自己在选集本中将“诗文选”本里“删去的几段又重新补入”，使《伍子胥》“能够完整地保持原形”^{[1]5}。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

版了十二卷本《冯至全集》，其中第四卷“据《冯至选集》全文收入”了小说《伍子胥》^[6]，故可与选集本视作同一版本。

总之，文生本、“诗文选”本和选集本之间文本异动现象比较复杂，以这三者为研究对象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小说的版本流变情况。《伍子胥》的修改过程横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在这段时间里，冯至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思想转向，这些心路辙轨也完整地体现在其文本内容的修改中。因此，研究小说版本流变，不但有利于探索冯至思想发展的复杂面貌，也有利于深入分析作家心路历程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诗意与现实的杂糅：1946年文生本《伍子胥》

1946年，文生本《伍子胥》出版后引起时人的关注，“有人写出评论，有人写信给作者”表达意见和感受^[7]。这些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伍子胥》不是小说，而是一首“简洁、晶亮透明的长诗”，通过它我们能够更真实地体验“当前人民的灾难，与国家的不幸”^[8]；另一类意见则认为，虽然小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完熟而透明的诗的果子”，但是“却没有了弓弦似的筋肉毕露的人生，真实的丑恶又崇高的美”^[9]。这两种意见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通之处。分歧在于，前者肯定了小说介入现实的力量，而后者则认为这种“干预”不够彻底；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承认《伍子胥》在风格上是“诗”的，但在“诗”中却散布着针砭时弊、描写现实的内容。

总的来看，《伍子胥》“诗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一，就语言来说，作家以清新的笔触，在小说中织就了一种浑融和谐的诗性视景。有学者认为，《伍子胥》是一部“运思式的诗化小说”，而决定其艺术创造的核心问题是语言问题^[10]。对此，陈敬容抱有相似的看法，她认为《伍子胥》之所以给人以诗的美感，关键在于“写人写物的那种笔致”，“每个字好像一颗珠子，个人的感觉是无限的浑厚和晶莹”^[11]。其二，就小说的精神世界来说，纯净的语言又为作者抒写主观感觉、反思宇宙和生命提供了便利，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沉思的诗”的品格。李广田曾将冯至称为“沉思的诗人”^[12]。“沉思”并非为了抵达体系化的

哲学世界，而是将自己思考宇宙、生命之所得印证在具有普遍性的日常经验上。在《漂水》中，伍子胥与浣衣女的相遇就极富画面感与象征性：

这是一幅万古常新的画图：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草绿里生长出来的一般，聚精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的面前。这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不知道。也许是一个战士，也许是一个圣者。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种在土地里了，将来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13]80}。

原本毫不熟悉的二人，在漂水边偶然相遇。通过浣衣女捧来的一碗米饭，两个陌生的生命就此缔结了关联的“种子”。在冯至心中，“关联”是世间万物的常态，他认为“在生命的深处”，总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联”^[14]。同样的哲思也蕴含在《十四行集》中：路和水、风 and 云，甚至那些被我们“经验”过的城市和山川，都成为相互关联的彼此，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15]。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伍子胥》是《十四行集》中某些诗篇的“变体”，二者都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冯至在小说中有意无意地呼应了20世纪40年代诗歌、散文里的哲思，这直接导致了《伍子胥》诗意的强化，也使其在风格上与传统的小小说文体相距甚远。质言之，时人评论《伍子胥》时反复提及的“诗意”，不仅指小说中那些流丽精致的文字描写，更体现为文本内部诗境的建构，其中大量涉及感觉描写和玄远哲思的内容则充当了主要诗料。

此外，《伍子胥》中还散布着许多讽刺现实的内容，使得原本浑融和谐的诗境被这些针砭时弊的议论所“破坏”。冯至在文生本《后记》中说道，小说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16]109-110}。其具体指的是以下几个情节：《林泽》里的几个从鲁国游学回来的儒者，硬要将“楚狂”指认为“陆浑之戎的后裔”，并强行测量了“楚狂”的头颅，该情节可能意在讥讽那些罔顾事实的研究者。《宛丘》里写陈国司巫一心为敌国楚国卖命，对楚人曲意逢迎，而墓园里的读书人本来不想同流合污，但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让妻子为敌国的士兵洗衣换钱。最终，贫穷与患难使他变得神经质。该情节可能意在讽刺抗战时期的投机分子，又影射了战

时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无奈。《昭关》里描写了戍边楚兵的惨状。因为疟疾流行，并且药物又被随军的医师盗卖给过路药商了，最终导致大量士兵毫无意义地病死了。该情节可能意在影射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底层士兵的悲惨境遇。在小说诗性化的基调下，这些“非诗”的杂音显得相当突兀，故而有评论者认为“现实化”的手法应谨慎使用，否则“不免损害整个故事的空气”^[17]。换句话说，这些现实性的内容使文本审美意图处于持续的危机之中。此外，作者冯至也认为小说中关涉现实的部分在结构中处于一种“掺入”状态^{[16]109-110}。可见，不论是读者还是作者本人，都注意到了文本中“诗意”与“现实”的张裂现象。其实，对20世纪40年代许多读者来说，真正能引起他们共鸣的恰恰不是“诗意”的部分，而是小说中指涉现实的内容。一方面，原本所习见的小说文体应是线索环环相扣、故事情节稳步推进的，但在《伍子胥》中，小说的叙事脉络被感觉抒写和哲学思辨所淹没，其过度的观念化使得读者认为《伍子胥》“不是一本太容易读下去的文艺书”^[8]。另一方面，小说中那些针砭时弊的情节因其深广的现实基础，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当时的一位读者说：“大家都刚从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战争里走出来，喘息未定，却又被牵着走进另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战争。因而对于这些方面，就特别感到亲切……”^[4]抗战造成的创伤还未抚平，国内又爆发了新的战争，底层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艰难地挣扎着。在那个“比抗战时期更艰苦，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更为惨痛”^[18]的时期，书中那些现实性的内容就不再是诗外的“杂音”，而成了“时代的声音”。所以，《伍子胥》中那些针对现实的不平之鸣，在很多读者看来，恰恰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因为这些内容能让他们“更真实的体验了当前人民的灾难，与国家的不幸”^[8]。换句话说，20世纪40年代的读者，在小说中那些现实性内容里感受到了时代的共振，而这种功能是抽象的“诗”所不能企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那种诗意和现实相互缠绕的紧张感，或许是在冯至长期构思、创作过程中渐次生成的结果。《伍子胥》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腹稿阶段。冯至说自己“十六年前”偶读《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

爱与死之歌》（下简称《旗手》）时，就被那“一幕一幕的色彩与音调所感动”，于是计划着将这种写法应用在伍子胥的故事上。《旗手》在形式上带有鲜明的诗体特征，而计划模仿里尔克的冯至，当时所神往的主要是“江上的渔夫与漂水边的浣纱女”^{[16]108}。可以说，腹稿阶段的《伍子胥》应是一部充斥着浪漫幻想的诗化文本。第二个阶段是初稿阶段。1942年，冯至刚刚开始创作《伍子胥》时只完成了七章，其中包括了哲思最为玄远、描写最为抽象的《江上》与《漂水》二节^{[16]109}。此时的稿本相较早期的设想，已经淡化了“音乐的原素”^{[16]109}，其面目已经与腹稿相去甚远了。第三个阶段是定稿阶段。在这一时期，冯至给原本只有七章的初稿本添补上了《宛丘》与《延陵》二节。这两节一则更加注重讽刺现实，一则更注重传达作者的人格理想。小说中诗的元素被进一步削减，现实的元素则进一步增加。由此观之，《伍子胥》的生成就是一个诗意不断减退、现实不断渗入的过程。与此同时，冯至的主观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嬗变：1941年到1942年，冯至在杨家山宁静秀美的山水中获得了一个绝佳的“经验”与“沉思”的机会，因此才能在《十四行集》《山水》和《伍子胥》的部分篇章中塑造出浑融和谐的诗境。1942年以后，冯至就很少写这种以玄思见长的诗和散文了，他将精力集中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上。对此，他解释道：“当时后方的城市里不合理的事称为常情，合理的事称为例外，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官长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寒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像支配了一切。我写作的兴趣也就转移……”^[19]可以说，对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感知和体验，成为冯至不断在《伍子胥》中注入现实性元素的直接原因。此后，冯至主要将精力放在现实针对性极强的杂文上。因此，对冯至来说，将诗意与现实整合在一起的《伍子胥》就成了其精神过渡的“一架桥梁”。它的身后是抽象的纯诗，它的面前则是现实性的杂文。

总之，文生本《伍子胥》体现出了一种“诗意”与“现实”相互杂糅的状态。前者来自作者对中国传统历史故事产生的浪漫幻想，后者则源于作者对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黑暗面的批评和反思。然而，真正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恰恰是现实化的部

分,而原本那些“掺入”诗中的不平之鸣在文本接受中也逐渐被理解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

三、淡化诗意与政治整合:1955年“诗文选”本《伍子胥》

自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以来,学习五四文学遗产的呼声在文艺界广泛传播。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响应,制定了更为全面的新文学选集出版计划,逐渐形成了一次五四文学作品的出版高潮。《冯至诗文选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印出版的。在当时,出版现代作家选集并不仅是为了呈现新文学创作实绩,更是为了以新中国历史言说重构新文学传统: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被进一步提高和凸显,而那些与革命活动有一定距离的作家则被“边缘化”。此外,时代语境对出版活动的影响还体现在文本内容上,为了适应新的文艺要求,作家在选文活动时对辑入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些修改尤其能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初作家心态的某种变化。

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总结国统区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严厉批判了追求美感和抽象的文艺趣味,认为它是因为知识分子“抵不住反动统治的低气压的压迫,经济生活的煎熬,又守着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公然把颓废主义呈现出来大众的面前,而且还要装出‘纯文艺’的高贵气派来骗取读者”^[20]之结果。在这种氛围下,当时以北京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列席“文代会”的冯至应该有所触动,他在参会前就表示“在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21]。到1955年,这种“自我改造”的冲动最初就体现在《冯至诗文选》的“选与不选”的问题上。他在回顾自己40年代的创作时说:“自己的认识不够,有时流于主观,反映现实,也就受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写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内容与形式都矫揉造作,所以这里一首也没有选。”^[5]在冯至看来,内容与形式的“矫揉造作”和“流于主观”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体现。由此可见,《伍子胥》之所以能入集,关键在于小说中涉及20世纪40年代现实的内容与50年代的文化环境具有一定契合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小说的创作与批评常常和“借古讽今”或“影射”联系起来。

特别是1956年“双百”方针推出后,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其中一些历史小说的写作也以影射的方式干预现实,小说《伍子胥》即因讥刺国统区的黑暗面而在50年代获得了正当性。因此,冯至对《伍子胥》的修改,自然也应该向着剥除诗意、增强现实性的方向努力。

一方面,“诗文选”本删改了大量涉及主观感觉描写的部分,把“梦寐”拉回现实,消除了渗透在其中的敏感、颓废和幻灭等“资产阶级”的情绪。以文生本第四节《宛丘》为例,伍子胥在流亡中对周围环境的感受逐渐流于抽象:“不用说江南变幻的云,江南浓郁的树林,就是水浅木疏的洧滨也恍若梦寐了。”^{[13]39}“诗文选”本将“恍若梦寐”删去,改为“不用说江南变幻的云、江南浓郁的树林,就是像洧滨那样的水浅木疏也难以见到了”^{[22]103-104}。这样一来,主人公沉溺于主观情绪而产生的恍惚感被剔除了,进而将头脑中的“梦寐”还原成眼前的现实。此外,“诗文选”本还对涉及梦幻、呓语的内容作了大段删除。例如,文生本《溧水》中写浣衣女和伍子胥分别后,觉得适才的相逢恍若梦境:

这不是一个梦境吗?在这梦境前她有过一个漫长的无语的睡眠,这梦境不过是临醒时最后的一个梦,梦中的一切都记在脑里,这梦以前也许还有过许多的梦,但都在睡眠中忘却了。如今她醒了,面对着一个新鲜的世界,这世界真像是那个梦境给遗留下来的一般^{[13]82}。

这段文字深入浣衣女的感觉世界,其过去的种种被幻化为梦境,而与远方来的旅人发生了某种联系后,她的生命得以完成,她获得了一个“新鲜的世界”。由于都是呓语式的表达,所以“诗文选”本《伍子胥》将该段文字直接删除了。

另一方面,“诗文选”本还删改了大量对宇宙、生命和人进行深入思考的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小说“沉思的诗”之品格受到破坏。例如,文生本《城父》里有一段描写伍子胥决定出亡时的心理活动:“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决定的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把它化为永恒。”^{[13]9}在这里,冯至继承了在《十四行集》中对“永恒”与“瞬间”之间关系的思考,而删去“永恒”,则破坏了二者的关联性。继而,其将伍子胥的心绪拉回现实,拉回“走”与“留”

的纠缠中，于是“诗文选”本将此句改为：“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在这瞬间做一个重要的决定。”^{[22]87}

再如，在文生本《昭关》中有这样一句话：“谁在这溪水声中不感到一种永恒的美呢？但这个永恒渐渐起了变化……”^{[13]59}“诗文选”本同样删去了“永恒”，改为“一年如一日，似乎没有变化。但事实上却渐渐起了变化……”^{[22]114}不过，从修改后“没有变化”和“起了变化”连用的情况看，这种修改虽然能弱化文本的抽象性，但使得语义更加缠结。此外，“诗文选”本中思辨色彩较强的内容也被大量芟夷剪裁。例如，在《溧水》中有一段浣衣女向伍子胥奉上米饭的描写：“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草绿里生长出来的一般，聚精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的面前。这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13]80}唐湜认为，这种想象过于西方化，而且十分生硬，“不像中国人的想法”^[9]。很明显，该段文字与20世纪50年代追求的民族化和现实化原则相悖，故而“诗文选”本将其删去了。

冯至在“诗文选”本《伍子胥》中，大量删改涉及感觉描写的内容，淡化小说“沉思的诗”的品格，进一步放大文本中的现实性元素。这些修改，其根本上是为了趋近当时的主流政治立场，“诗文选”本中人物形象的变动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初期流行的阶级化典型论认为，塑造典型就是将“阶级的人群的性格特征”抽象出来并具现于“一个人物身上”^[23]。这种观点渗入到“诗文选”本的修改中，表现为作者对人物情感态度的变化。例如，在文生本中作者还借伍子胥之口表白对季札的憧憬：“其实我所钦佩的，正是那个连王位都不置一顾的季札。”^{[13]90}而后来的“诗文选”本则弱化了对季札的赞赏态度，并删去了该句。对20世纪40年代的冯至来说，季札正是在“一盘散沙”的现实中保持“纯洁”的精神象征，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者，是冯至理想人格的化身。但这种“个人主义”话语在50年代是不合时宜的，加之季札的身份是吴国贵族，其与冯至服膺“人民”、改造自我的决心相悖，因此，他对人物形象也作了一定修改。再如，在文生本中，伍子胥流亡到“江上”时想：“郢

城里一般的人都在享受所谓眼前的升平，谁知道这时正有一个人在遥远的江上正准备着一个工作，想把那污秽的城市洗刷一次呢。”^{[13]70}到了“诗文选”本中，作者将“一般的人”改为“王公们”，这样，骄奢淫逸的“特权”就被集中到“郢城的王公们”身上，强化了普通民众和贵族之间的阶级对立。在将“王公们”划拨于历史暗角里的同时，冯至对于普通民众形象的修改则体现出进一步纯洁化、高尚化的趋势。例如，在文生本《昭关》一节中，冯至以“乞儿”来比喻巧取豪夺的“新兴”贵族：

“而又有一群新兴的人，他们开始时，只好像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一群乞儿，先是暗地里偷窃，随后就彰明昭著地任意抢夺，他们那样肆无忌惮，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保护着他们。”^{[13]59-60}“乞儿”一般对应的是贫苦无告的底层民众。从阶级立场上来看，给他们贴上“暗地偷窃”或“任意抢夺”的标签明显不合适。因此，在“诗文选”本中，该句被改为：“而又有一群人，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开始时，暗地里偷窃，随后就彰明昭著地任意抢夺，他们那样肆无忌惮，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保护着他们。”^{[22]114}

总之，冯至对《伍子胥》的修改既是思想改造、重塑自我愿望的外化，也是意识形态整合的结果。通过对小说的修改，《伍子胥》中针砭时弊的现实意图被反复强化，而抽象性的审美意图则被不断弱化。与此同时，冯至也颠覆并重塑了自己的写作史，《十四行集》因其流于主观而被放弃，《伍子胥》则因掺入了反映国人“痛苦”的内容而获得正当性。然而，“诗文选”本对《伍子胥》诗意的淡化是有限的，也根本不能让一部带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16]110}彻底转变成民族风味的《伍子胥》。所以，改写后的小说中仍然充斥着大量感觉描写，仍然带着一种沉思的气质，这与冯至心中“对人民有益的作品”的要求也相去甚远。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伍子胥》再未重印过其他版本。

四、去政治化与再诗化：1985年选集本《伍子胥》

1982年，冯至应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要求选编《冯至选集》。他认为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对《伍子胥》修改得“过了头”，故而将原来删改的部

分“重新补入”，使其“能够完整地保持原形”^[15]。为了更加贴近现代文学复杂丰富的文学现场，《冯至选集》所选篇目有了很大扩充，重版后收录的文本也更加接近1950年之前的面目。不过，“恢复原貌”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文本编校状态，因为受到历史语境与作家心态影响，现实中大多数文本是变动不居的。实际上，冯至在校订选集本《伍子胥》时，虽然恢复了许多在“诗文选”本中被剪裁的内容，但也保留了一些50年代的改动。通过考察选集本《伍子胥》的“改与未改”“删削与保留”等文本异动，可以厘清冯至在新时期时代转折中的思想变化。

选集本《伍子胥》所“恢复”的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政治影响而删除或修改的内容，作者希望借此来彰显对五六十年代话语机制的否定和对新时期话语机制的认同。在“诗文选”本的修改中，冯至曾受到文学典型阶级论影响，对《伍子胥》中的人物价值按其阶级类属作了重新排序。机械化、阶级化的典型论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有所松动，但到了60年代却被提高到反对修正主义与“反动人性论”的高度上^[24]。这样，由于作品中的人物按其阶级立场来规范言行，就使得文本成了一个反复演绎政治观念的空间。因此，对新时期出版的现代文学选集来说，要重构一套新的文学话语体系，就要剥除五六十年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对选集本《伍子胥》来说也是如此。“诗文选”本《伍子胥》为了配合50年代政治言说，将季札的形象不断矮化，删除了许多冯至表达钦敬之意的描写。在选集本中，冯至将这些内容全部修补回来了。例如，在《延陵》一节中补回了：

“其实我所钦佩的，正是那个连王位都不置一顾的季札。”^{[25]360}再如，在《江上》一节补回了：“一代的兴隆不过是几十年的事，但是一个人善良的行为却能传于永久。”^{[25]347}很显然，该句有将个人的能量凌驾于历史之上的“嫌疑”。在50年代，“个人”在国家、阶级叙事面前必然是要式微的，这也是“诗文选”本中删去该句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对40年代的冯至来说，个人的价值却值得肯定。他声称，“纯洁的个人主义”可以与“健全的集体”并行不悖^[26]。新时期以后，冯至更加倾向于否定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干预。他说，自己过去觉得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觉得中国从此

就兴旺起来了，写的大都是‘颂诗’，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可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带有廉价乐观主义的意味”^[27]。但过去的动荡并不是归罪于几个人就可以了事的。“二千多年封建主义在中国人头脑里形成的、与时代相违背的落后”^[28]的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每个‘炎黄子孙’都不能或多或少地逃脱一定的责任”^{[29]210}。不难看出，冯至关于“人民”的想象与50年代相比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人民”从知识分子学习、服膺的对象转变成了一个需要被教育、提高、反思的“群体”。知识分子在重拾主体价值的同时，也再次陷入对“人民”的怀疑当中。

冯至“恢复”的第二部分内容是那些关于幻想、梦境的描写。伴随着对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的剥除，选集本中《伍子胥》的诗性特征再次得到强化。“诗文选”本《伍子胥》中删节最多的部分是表现感觉和沉思内容。冯至在1982—1983年选校《冯至选集》时，特意将“里面删去的几段又重新补入”^[15]。例如，在“诗文选”本《昭关》中，有这样一段表现伍子胥思乡的内容：“从少年到今日，至多不过十几年，如今他和他的故乡竟距离得这样远了，只有这不间断的溪水声还依稀地引他回到和平的往日。”^{[22]115}在选集本《昭关》中，作者将其复原为：“从少年到今日，至多不过十几年，如今他和一般人竟距离得这样远了，是他没有变，而一般人变了呢；可是一般人没有变，只是他自己变了？他无从解答这个问题，他觉得，独自在这荒诞的境界里，一切都远了，只有这不间断的溪水声还依稀地引他回到和平的往日。”^{[25]343}可见，冯至在这里要表现的是，伍子胥在沉思中渐渐摆脱了旧日的桎梏，又在痛苦中获得了蜕变和再生的契机。“远离”所象征的是一种抵达至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物与普遍性经验拉开距离，在挣扎中获得了超越性。但经“诗文选”本的删改，“远离”的意义被限定在空间当中，“沉思”也被现实化为“思乡”。再如，《宛丘》中有一段写伍子胥看见两座石碑遗迹，从而联想到“平凡的山水”和“宇宙的中心”之间的关系。在“诗文选”本中，该段被作者删去，但选集本中又将其重新补入。

同时他心里想，远古的帝王，启发宇宙的秘密，从混沌里分辨出形体和界限，那样神明的人，就

会选择这样平凡的山水，作为他们的宇宙的中心吗？也许只有在这平凡的山水里才容易体验到宇宙中蕴藏了几千万年的秘密。子胥一路上窄狭而放不开的心又被这两块石碑给扩广了。他又思念起一切创始的艰难，和这艰难里所含有的深切的意义^{[25]332}。

此处，作者用“平凡的山水”宣告主体可以从中获得普遍意义上的经验，而这种普遍性恰恰是抵达“宇宙的中心”的通途。于是，流亡路上的伍子胥，以这两块石碑为契机，以一路经验的山水为媒介，拓展了他原本狭窄的心胸，并陶醉在玄远艰涩的沉思中——思考着“一切创始的艰难”和其中“深切的意义”。

可见，冯至通过恢复因政治原因而删去的内容，使得小说适应了新时期的时代要求；又通过恢复抒写感觉和玄思的内容，使小说重获了“沉思的诗”的品格。然而，选集本《伍子胥》并非只是一味恢复文生本的“原貌”，其在某些方面也继承了“诗文选”本的改动。例如，在《宛丘》中，子胥遇到一位说话“时而骄傲，时而谦卑”的读书人，为了生存，他的妻子不得不为楚国的敌兵洗衣服赚钱。在文生本中，这位读书人的态度比较暧昧，他强调了妻子这样做的无奈：“咳，我是知足的，我是多么穷苦也活得下去……”^{[13]48}在“诗文选”本中，这句话被改作：“咳，我是多么穷苦也不肯叫她去从敌人手里讨生活呀……”^{[22]109}相对文生本而言，“诗文选”本彻底否定了这种“资敌”的行为，也更加坚定了读书人敌我界限分明的民族立场。新时期虽然倾向于否定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立场，但是民族立场的言说方式却并未发生变化，因此，选集本保留了“诗文选”本的这处改动。此外，选集本也并未保留原本散布在文生本中的颓废感。例如，冯至在文生本《漂水》一节中写道，浣衣女“望着子胥拖着自己的细长的身影一步一步地走上渺茫的路途，终于在远远的疏林中消逝”^{[13]82}。而在“诗文选”本中，作者删去“渺茫”，将该句改为“望着子胥拖着自己的细长的身影一步步又走上路途，终于在远远的疏林中消逝”^{[22]126}。选集本《伍子胥》保留了此处改动。再如，文生本《涓滨》写子胥见太子建不足以成事，不得不再次“出亡”：“如今他也由于身边一切事物的幻灭孤另另地剩下一个人，

不知应该往哪里去。”^{[13]35}“诗文选”本改为：“如今他也由于对太子建幻想的破灭孤另另地只剩下一个人，不知应该往哪里去。”^{[22]102}于是，“身边一切事物的幻灭感”变成了对太子建的失望，人物情绪的落脚点被拉回现实，进而将行文中的颓废情绪消除了。选集本《伍子胥》也保留了此处改动。冯至之所以没有恢复文生本中那些带有幻灭、颓荡气质的内容，主要与他在新时期之初的思想、心态有关。1984年，日本学者佐藤晋美子曾致信冯至，询问他为何对《北游》的第十二章作了那么多改动。冯至说，在自己的旧作中“有个别诗句，尤其是诗的结尾处，写得过于悲观或是没有希望”，他不愿意用“往日暗淡的情绪感染今天的读者”^{[29]254}。1980年代，新时期话语在告别“文革”的同时，通过“现代化”等言说机制重启了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冯至认为，此时“应多说些振奋精神的话”^{[29]209}，而那些迷惘、困惑、失望、颓废的情绪依然显得不合时宜。

总之，冯至虽宣称新时期对选集本《伍子胥》的校改意在“保持原形”，但仍然保留了一部分“诗文选”本对文生本的删改。这说明，新时期宣称的所谓“恢复原貌”，只是现代文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话语中超脱出来的叙事策略。冯至在“修改”与“保留”的问题上进行了慎重选择后，不但使新版本更好地契合了新时期的历史语境，剥除了渗透在“诗文选”本中的政治因素，还为小说重拾了“沉思的诗”的品格。

综上所述，在冯至小说《伍子胥》的版本流变史中，以1946年文生本、1955年“诗文选”本和1985选集本之间的文本异动最具代表性。文生本是冯至在十几年来不断思考、不断生成的结果，也是一个不断减少“诗意”、进而“现实化”的结果，所以20世纪40年代读者才会感受到小说中杂糅了诗意与现实。1950年代，冯至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进行思想改造，去除“资产阶级”文艺观，其体现在文本修改上就是对大量涉及感觉和沉思内容进行删除，并调整了与时代要求相悖的内容，因此淡化了小说的诗意。1980年代，文学界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政治话语进行反拨，重新建构起一套现代文学的历史言说体系。于是，冯至在选编《冯至选集》时，对《伍子胥》中涉及50年代

政治影响的部分作了删改,恢复了40年代的文本原貌,这在客观上又强化了小说的诗意。

《伍子胥》中“诗意”的去留,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冯至不断进行自我否定的精神图示。他曾作“自传诗”以自嘲:“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30]50年代否定40年代,80年代又否定六七十年代。不断的“自我否定”,在饱经沧桑的晚年冯至看来,似乎略显荒诞,但却是必须的。新的主体的生成需要将“新我”从“旧我”中区别出来,作家的精神流变史就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不断获得新认同的过程,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本修改,则恰恰反映出作家在其主体重塑阶段的复杂精神面向。长期以来,学界对《伍子胥》的研究仍集中于分析它在20世纪40年代冯至精神转向中的过渡作用,重视其与作家40年代前后的创作的相互勾连,在“文本间性”上发掘其阐释潜力。现在看来,这种解读模式始终无法跳出冯至“桥梁说”的框架。本文基于版本视域,将冯至的小说创作置于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当中进行考察,其不但为我们了解冯至的心路历程提供了新视野,同时也为作家精神流变史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沟通之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冯至. 诗文集自选集[M]//冯至. 冯至选集:第1卷.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 [2] 吕丁. 冯至的《伍子胥》:现代创作略读指导之一[J]. 国文月刊,1946(80):30.
- [3] 冯至. 宛丘[N]. 观察报(昆明),1945-03-17(2).
- [4] 马逢华. 伍子胥[N]. 大公报(天津),1946-12-22(6).
- [5] 冯至. 序[M]//冯至. 冯至诗文选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 [6] 冯至. 伍子胥[M]//冯至. 冯至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68.
- [7] 姚可崑. 我与冯至[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99.
- [8] 田堃. 伍子胥(书评)[N]. 大公报(重庆),1946-10-15(6).
- [9] 唐湜. 伍子胥(书评)[J]. 文艺复兴,1947,3(1):124-126.
- [10] 钱理群,谢茂松. 冯至博士《伍子胥》新论[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103.
- [11] 陈敬容. 伍子胥(书评)[N]. 大公报(上海),1946-12-3(12).
- [12] 李广田. 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J]. 明日文艺,1943(1).
- [13] 冯至. 伍子胥[M].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 [14] 冯至.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M]//冯至. 山水. 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54.
- [15] 冯至. 十四行集[M]. 桂林:明日社,1942:40.
- [16] 冯至. 后记[M]//伍子胥.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 [17] 常乃慰. 书冯著伍子胥后[J]. 龙门杂志,1947,1(4):15.
- [18] 冯至. 沙龙[J]. 观察,1946,1(12):13.
- [19] 冯至. 昆明往事[J]. 新文学史料,1986(1):75.
- [20] 茅盾. 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M]//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53-54.
- [21] 冯至. 写于文代会开会前[M]//冯至. 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42.
- [22] 冯至. 伍子胥[M]//冯至. 冯至诗文选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 [23] 巴人. 文学论稿[M].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331.
- [24] 陆学明. 建国以来我国典型理论研究述评[J]. 当代文艺思潮,1984(5):35-36.
- [25] 冯至. 伍子胥[M]//冯至. 冯至选集:第1卷.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 [26] 冯至. 论个人的地位[M]//冯至. 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87-288.
- [27] 冯至. 谈诗歌创作[M]//冯至. 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46.
- [28] 冯至. 振兴教育刻不容缓[M]//冯至. 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452.
- [29] 冯至. 冯至全集:第12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30] 冯至. 自传[M]//冯至. 冯至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91.

责任编辑:黄声波